

庸者竊品与方家卓评

龙连荣著编

二〇一五年七月·凯里



M
I207
670

勇者寂寞与方家卓评

龙连荣著编

请

凯里学院
图书馆

惠存雅正

凯里学院图书馆



0955295

凯里学院图书馆

藏书



个人简介

龙连荣 三穗县人，终生从教近五十年，历任小学教导主任、中师教师、高校副教授、系主任、学报主编，兼任函大、电大、老年大学教师。工作认真负责，育人效好，教书绩佳，科研果丰，颇受学生、社会好评，多次被评为国家、省、州、市、县、校的先进。著有《小学古诗讲析》、《论文选》、《杂文选》、《散文选》、《韵文选》、《新纪吟选》、《耋龄诗词联文选》、《对联研究》、《现代汉语声韵》和《三字经诠释》等，共计四百多万字。主编《霜枫诗选》、《黔东南当代旅游诗词选》、《原生态黔东南诗词选》、《黔东南州庆五十周年诗词选》、《黔东南诗坛名录》和《中国侗族教育史》（与人合编）；主编或参编大、中、小学教材、教参与课本；参编《中国对联集战·贵州卷》和《中国诗词文库·贵州卷》；点校《孙应鳌文集》、龙绍讷《亮川集》和徐家干《苗疆闻见录》等古籍多种。任过多种报刊与诗文集的主编、副主编或责编。有几百篇诗文入选全国大型诗文集并获奖，是黔东南州社科奖三连冠的唯一获得者。生平事迹入选百余种人物辞典。学业涉及语、文、史、哲、教、经等领域，是一位集教师、作家、诗人、学者和编辑于一身的多面手。

龙连荣诗词作品讨论会合影



目 录

自序 1

庸者羸作

一、《中国侗族教育史》编印始末	3
二、一生中七次路口的选择	9
三、难忘的“1·16”	16
四、独处岁月	21
五、写诗心目中要有读者	27
六、浅谈《郁离子》的议论技巧	30
七、孙应鳌与炉山	35
八、诗韵断想	39

方家卓评

一、赞贵州老年人第一本新韵诗集	石德兴 43
二、新韵潮流不可阻挡	石德兴 44
三、“龙连荣诗词讨论会”发言综述	黔东南诗词编辑部 46
四、连延焕彩 荣耀吟坛	王大为 49
五、平直素雅也风流	罗国刚 56
六、诗书传后世 笔墨育新人	廖楚渔 58
七、试论龙连荣诗词的三大艺术特色	傅安辉 60
八、生命不息 耕耘不止	胡 锐 62
九、诗骨诗风见精神	吴锡镇 64
一0、不足与期待	文志光 67
一一、独辟门径 博通专精	黄克雷 68
一二、一首朴实、精巧的好诗	蒋时化 74
一三、吟友赠诗	76
附录：被《中国知识网》收录的论文（存目）	86

自序

不知从何时起，书前有“序”，书后有“跋”（今称“后记”），并逐渐形成一种惯例。

以前，对此举我总认为是多余的，心里常存在着“不以为然”的看法。阴差阳错，轮到自己也能出点小册子了，方懂得有的话确难写于书中，而非有个“序”或“跋”之类的地方才方便把要说的话说出来。以前，对这点我无知，现在懂了，总算也是一个进步吧！而且，从此读书，也爱先读“序”和“跋”。

我这本小册子，依照惯例，本人写了个自序。主要想说两点：

第一、名称与内容

名称是由“庸者窳品”与“方家卓评”组成的并列词组担当，故内容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庸者窳品”是自己所写的俗文。自己嘛，是一介农民子弟，天资平平，未入名校，未得名师点拨，只堪称为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故自名之为“庸者”，这非谦虚，而是实情。收入的几篇俗文，所记非大事，所抒非豪情，所论非宗旨，肤浅片面性在所难免；且表达拙劣，语言粗鲁，故自名为“窳品”，恐怕还是名副其实的。

“方家卓评”部分，是我搜集到的文明诗友对我诗文的评论汇编。他们都是饱学之士，学有专长，的确都必须称之为“大方之家”。官方授予他们的高级职称和同业界的口碑，就足以说明我是言之有据的，绝不是吹捧。他们的评论，我无能再作评论，因为都是“卓评”。我总的感觉是：“说长”，

当中有些溢美、拔高和夸大；“道短”，当中却有折扣、隐讳和照顾。究其原因，恐怕是我年纪大了，按中华“敬老”的传统，他们是给予我的优待吧！

“吟友赠诗”，是方家以诗歌形式带抒情性的评论，故也收录进“卓评”中。

这本小册子跟我已印行的十多本相比，很显著的不同点，是他人的与我自己的所占篇幅几乎大致相当。这一方面，为我的小册子遮丑掩瑕而增彩添辉，但另一方面，自然也感觉有些“掠美”之嫌，好像是拉了别人的大旗来装点门面。其实，我的本意是：各文朋诗友写这些评论是看得起我，是费了心血的，理应不该泯灭；再则，收集成册便于阅读，可省查找之劳。

第二、说明与致谢

不公开出版而内部印行，原因有二：一是质量不高，意义不大，二是经济拮据，负担不起。

内部印行决定只能内部赠阅，范围当然也就有限了。但它毕竟是一本“书”了。因此，诚望得到此“书”者，尽量说出你的看法，不必有任何顾忌；若能将看法以电话或文字等方式告诉我，那我是十二万分感激的。

吟友胡伟能书写书名并审阅部分文稿，特向他致谢。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日于凯里

《中国侗族教育史》编印始末

由教育部教育科研所韩达教授任总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多卷本），是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的重点课题之一，而《中国侗族教育史》则是它其中的一卷。

韩达教授认为：我国55个少数民族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但分布地域却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她们的教育既有不少相通于全国教育的共同规律，也有很多各自独守不群的特殊规律。可是时至当代，她们的教育及其历史发展规律未有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成果面世。

为了偿还这笔历史旧债，填补中国教育史的研究空白，韩达教授自1990年起，奋力发动和积极组织，历经两度寒暑，至1992年6月25日，《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多卷本）终获全国教育科研规划领导小组批准立项，并拟推荐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或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获准立项后，韩达教授奔走于全国各地，致力于宣传、求援和任务落实等工作。

当时，三都民中副校长周崇启，正在我黔东南民族师专读中文本科班。一次课余闲谈中，他言及为编水族教育史之事，问我能否接受和承担主持侗族教育史的编纂工作。闲谈后，征得我的同意，他即向韩达教授在贵州的联系人谭老师转达我的意向。不久谭老师就亲临凯里找我商量其事。我当时和盘道出自己以下的想法：身为侗族一员，终生从教，今有编写侗族教育史的任务，照理说应该义不容辞，当尽心尽力玉成，可我只

能教书，做点文字工作。于发动、组织黔、湘、桂、鄂四省区侗族地区教育部门来共同完成这项史无前例的工作，尤其是筹措活动、出版经费，那是无能为力的。经短暂考虑和交谈，我提议去黔东南州教委找当时任教委主任的侗族干部杨朝富商谈。经我谈清事情的原委，又得谭老师的从旁有力宣传，问题出奇地立即获得解决。我则力荐杨朝富牵头，我为助手，共同完成此举。杨朝富同意我的建议，同时，提出两条要求：一是教育部教科所须出具委托证明，二是给予必要的启动经费，才便于开展工作。

1993年5月13日，全国教育科研规划小组办公室寄来委托证明，明确《中国侗族教育史》由黔东南州教委杨朝富和黔东南民族师专龙连荣负责编撰，“请有关部门大力支持”，而且送来1000元启动资金。为落实计划，争取早日开展工作，总主编韩达教授不顾年逾古稀和数千里之遥，专程于1994年5月16日来到凯里，催促我们尽快上马。

经杨朝富与我共同商量，向有关方面作了接受任务和策划落实的情况汇报，在黔东南州教委的大力支持下，以州教育学会的名义，向黔、湘、桂、鄂四省区的侗族地区的县、市教育部门发出邀请函，于1994年5月14至15日，在凯里召开《中国侗族教育史》编撰座谈会。应邀到会的有剑河、黎平、天柱、榕江、锦屏、通道等县、市和州有关单位以及韩达总主编的代表。

在会上，首先传达和学习《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批准通知》、《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多卷本）丛书编写计划》和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出具的委托证明。其次，通报

了兄弟民族关于他们的教育史编写的情况。第三，汇报了我们计划编撰《中国侗族教育史》的初步设想。经讨论，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都表示全力支持和争取尽早完成。会议决定成立编委会，确定了正、副主编及编委的初步人选；修改和通过了我们草拟的《中国侗族教育史》章、节目录；大家一致同意按丛书规定的指导思想与统一体例，广搜材料，尽可能详细地以县、市为单位先搞小贯通，然后交正、副主编汇总进行大贯通的编撰。会后，编委会及时将这次座谈会纪要上报总主编韩达，并印发给侗族地区各县、市教育行政部门。

这次会后，各县、市都动了起来，其中以新晃县最为突出，成立了领导班子，安排了专门人员和经费，但有的县、市行动滞后。为了了解情况和推动工作，我们决定下去走一趟。1994年8月上、中旬，杨朝富和我，曾先到天柱、会同、靖州、通道、三江、龙胜等县，后于同年11月上、中旬，又到玉屏、万山、新晃、芷江等县走访、摸底和催促，还到贵州民族学院和贵州民研所去求教专家、收集资料。

1995年3月23日至24日，在黎平县有关领导的关怀和黎平县教委的支持下，在黎平召开了编撰情况汇报和经验交流会，我们汇报了走访情况，与会各县、市代表汇报了各自的工作，并交流了经验，这次会于书稿的编写的确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会后，各县、市书稿陆续送达凯里，总纂工作便有序地迅速展开。具体分工是：龙连荣负责绪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章，卢仕忠负责第五章，杨朝富负责第六章和后记。其步骤是：

先仔细研读各县、市送来的书稿，鉴别真伪精粗，品评价值高低；再跟我们直接搜集、掌握的资料进行比较，并参考、借鉴有关的图籍，择善和选取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材料，编入既定的相关章、节之中：后总纂人才交换阅读彼此的成稿和提出意见，经修改为具有统一风格和可读性的初稿，方交付打印。

打印校改，耗损心力，费时数月，于1996年6月初才完成，于同年8月26至28日在三江召开了第一次审稿会。到会领导、学者和各县、市代表及参编人员共计50多人。经过与会人员的仔细阅读和认真讨论，大家在肯定书稿所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不足与如何修改的意见。为补充鄂西侗族地区的教育发展史料，正、副主编又专程赴恩施州教委、宣恩县教委联系走访，请他们提供材料，并深入到相关侗族乡镇中、小学进行实际考察，获得了一些可贵资料。

根据这次审稿会提出的意见，回到凯里之后，由我、杨朝富和卢仕忠三人用了一月左右的时间，按原来分工对书稿作了一次全面、细致的修改、通纂、充实和润色，使全书稿本达到40余万字，并重新打印。

1996年11月20至21日，在玉屏召开第二次审稿会。新晃、通道、龙胜、三江、万山、岑巩、三穗、天柱、剑河、锦屏、从江、榕江、黎平等县、市（特区）的代表及黔东南州政协、州民委、州侗学会及玉屏县负责人出席审稿会。在会上，大家一致表示对修改后的第二稿很满意，认为只需改正排印中的错漏和修正某些细节，即可送交国家教科所审查。

第二次的全面、深入修改，工作量不大，负责总纂的仍为龙连荣、卢仕忠和杨朝富，仅用十多天即大功告成。书稿印毕、

装订完好后，于1996年12月中旬，挂号邮寄给总主编韩达教授。韩达教授审阅后，即转呈国家民委作最后审定。

1997年8月20日，国家民委教育司正式作出如下审定意见：“《中国侗族教育史》书稿，经我司组织有关专家审阅后，认为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了侗族教育史。该书稿掌握了侗族教育的特点，结构整齐，材料充实，已达到出版水平。同意专家审稿意见，请根据专家审稿意见修改出版。”

好事多磨，事物的发展经常有难以预料之处。不料总主编韩达教授年高染病，未能及时将国家民委教育司的审定意见及时转送我们编委会，直到1998年杨朝富、卢仕忠专程进京拜访方才见到该文，但错过了广东教育出版社承诺负责出版的时限，因此就拖了下来。当时，韩达教授口头表示：我病了，筹集资金与联系出版已无能为力，你们根据国家民委的审稿意见就自行筹资出版好了。我们曾多方求援，设法筹集出版经费，但都毫无结果，只好将书稿尘封于橱角。这一拖，竟然长达近二十年，由上世纪末一直拖到本世纪的第十五个年头。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珍珠自有识宝人。黔东南州侗学研究会慧眼识“宝”，2014年10月经会长会议研究，以《黔东南侗研纪【2014】6号》文决定：“（1）同意从侗学研究会业务经费中，安排5万元资金，对贵州、湖南、广西、湖北四省区侗学研究会编著的《中国侗族教育史》，进行审定并公开出版。（2）《中国侗族教育史》的打印、校对、审定工作，由付安辉同志牵头负责。”

有了黔东南州侗学研究会的大力支持，后又得到州民宗局、州教育局的资助，出版经费总算获得了起码的保证，书稿得救

了，不至于长久尘封而变为一堆废纸。这就将几位总纂人的积极性又一次激发出来。在保持送审书稿原貌以示历史真实的原则下，三位总纂人只对书稿原未发现、改正的排印差错作纠正，对重新排印书稿作认真的校对，对拖延了近二十年的缘由在后记中作了补充说明，另外，依惯例补上序文。付安辉的确不负州侗学研究会的重托，全力以赴安排书稿的打印，并通校和最后核校书稿，积极做好出版、通联工作。

2015年7月，书稿交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3000册，其中精装2000册。拟于2015年下半年举行首发式，至此，《中国侗族教育史》的编印方打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中国侗族教育史》编撰历时两年多，待印却长达近二十年，最后才得以顺利刊行面世。这是黔、湘、桂、鄂四省区侗族地区各级领导和教育部门关心、支持的结果，是提供资料的各方人士和参编人员辛勤劳动、通力合作的结果。我以此文简述编印始末，是让读到该书的人们，知道它成书背后鲜为人知的编成早而出版迟的一些事实，不至于年久造成讹传或遗忘。但这只是挂一漏万的照实粗叙，唯一目的是维护历史的真实以正视听，并非全面细致的详写，还望广大的知情者和玉成者鉴谅。

《中国侗族教育史》虽集中了众多参与者的智慧，又几经修改，但她毕竟属该领域的第一部专著，不足定然难免，诚盼方家教正。最后，赋诗一首作结：

搁角尘封十九年，今朝终获见青天。

侗族教史第一部，虔献国人慰祖先。

2015年月日

一生中七次路口的选择

路无论大小、直曲，其途中都有路口。对这路口，现俗称“路岔”，古时则名为“歧路”。道路里程愈长，相应地“歧路”也就愈多。世间所有的路，莫不如是。

人生世上，其一切活动都是与路密不可分的，都要或多或少、或远或近去“行路”，并在“行路”中，不可避免地要遇上难以估计的大小不等的“路口”。为给行人指明应走的路径，不至于迷途，从前在这些路口，都立有指路碑，上书（刻）前、左、右各去何处。这一善行，的确为过往者提供了方便，大受人们赞许。现今继承此举，不仅大道通衢有更醒目的路牌，而且在汽车等交通工具上还装有卫星的导航设备。因此，你哪怕行走于陌生的异乡，凭着这导航设备显示的路线图，不用向人打听就能准确地到达目的地。

面临岔路，选择哪一条好，实在是一桩使人万分为难的事。《列子·说符》写道：“杨子之邻人亡羊，既率其党，又请杨子之竖追之”，最后无果而返，就是因为“歧路之中又有歧路，吾不知所之”造成的。心都子关于“大道以多歧亡羊”的感叹，确属事出有因。而非无缘无故的捏造。

如果说，人行走的旅途是以里程计其空间之“路”远近的话，那么，人一生所经历的岁月，则是以时间的多少表明其久暂的“道”了。前者有“路口”，后者也不例外。

我今届八十有四，该属耋耄之龄，应称老翁，并非冒充，现来回顾，在这近三万天的岁月中到底遇到多少“路口”，虽是亲历的，但却忆不全也说不清了，现只能择其记得起也比较大的七次简述于后：

第一次，是五、六岁时突患重病，父母请巫师问卜，说是魂落“穴家”，须打一堂“老师”，请道士做法事三天方可免除。救命要紧，别无他法。父母勒紧裤腰带，照实办了。说来也怪，的确应验了俗话说的“蚀财免灾”，疾病却奇迹般地痊愈了，而且获得了读私塾、念小学和上初中近十年的健康、平安。这一次“路口”是父母替我所择，攸关性命，恩重于山。

第二次，是初中结业时，家境贫寒，无力使我继续升学深造，只好去报考富家豪门子弟不屑一顾的师范，希图通过苦读获得一个饭碗。凭着小学、初中学习的知识，在众多年长于我的应考者中，我以优异成绩名列录取之榜首。可命运作弄我，染上疾病，在生活、学习费都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父母哪有分文给我治病。求告无门，父亲领着我，只好向校方申请休学。此时，我心中明白，这一“休”，我连续读书的机会即宣告结束。小小的十五岁，何去何从，严峻的前途问题摆在面前，要求我作出回答。

第三次，是考上小学教师被排斥。

因病与穷辍学，但吃饭还是每天都必定要吃的，这是治病和生存的最起码条件。父母日渐衰老了，我也即将告别少年期而迈入青年期，总是依赖父母过日子，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就跟父母学干力所能及的农活。但进取心未全泯，有空还是翻阅读过的书本，以求巩固既学到的知识，待机会再求进取。

时过半年，春节后不久，县里招考小学教师。我随着年龄不等的数百名应考者，胆怯而怀着希望地进入考场去角逐。以较扎实的知识功底，而获得名列第四的好成绩。处于茫然人生无所适从的我，顿时觉得眼前有了一线亮光。心想，这可有活干了，也可有碗饭吃了！

可分配工作后，两个月左右，竟然调动四次，几处校方和县教育科，将我作为“皮球”，踢来踢去。毫无涉世经验的我，跑来跑去，无法应对。父亲思考了好几天，最后才愁苦地告诉我说：我们没有后台，人家背后搞了手脚，看来你靠真本事拿到的饭碗又将丢了。

社会黑暗，我作为一个普通农民之子，求告无门，只得自认倒霉，放弃了这份苦苦挣来的工作，所得仅是四石薪谷和又一次的失学、失业。现实警示我：自然界的羊肠小道难行走，人生道路上的曲折坎坷之“行”那就更难哩！

第四次，解放后又一次考教师。

临近解放，我未满十八岁，如实地说，尚是个大孩子。由于时局紧张与家庭不幸的双层夹击，在兵荒马乱的1949年10月2日（农历8月11日）结婚，11月7日家乡即宣告解放。因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对共产党是非常敬畏，后经观察才敢于接近，继而参与征粮、支前活动又加深了了解。

打算盘，我是读书时学会的。接管长吉区的领导看我算盘打得熟，打算让我做财经工作。我将此事告诉父母，父母一致反对说：快莫去沾那管钱、管物的边，你年轻无经验，要是别人陷害你，家中又没有能力赔偿，岂不是会毁了你么？

人穷怕事，我婉言谢绝了领导的好意。不久，有了报考小学教师的消息，我就毅然弃政从教了。

先是县里考试送到专区师训班，再经考试选送省文教厅师训班，学习半年结业后分回县里。从此，我就正式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了。

解放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壮举，当年尚未未成年的我，

在这次伟大的事件中没站错队，没走错路，实属幸运。其后弃政从教，虽是父母教育的促成，也是我明智地抉择的结果。我自己深知，禀性愚钝，不善交游，又缺组织和斡旋等办事的必备才能，绝非从政的料，更非理财的角儿。乐当孩子王，才是醉心所追求的。就这样，我由这个路口便踏入教育之道，由小学而师范，师范而高校，再由高校而老年大学，连续干了近50年才走下讲台。

第五次，人民送我考大学和我要求系转科。四年小教生涯我教过各年级的功课，任过少先队辅导员、科任，班主任和教导主任，让我受到了许多锻炼，复习、巩固了原有的知识，学到了教育、教学的诸多方法，培养了对教育、教学工作的感情，坚定了从教的信心，是打算干一辈子小学教师的。因我的工作效果，学生满意度高，领导、同行和社会的评价都相当好，证明从教之路我是选择对了，所以没有见异思迁的想法。

建国后，人民教育事业发展甚快。为确保中学师资，便从小教队伍中选送一些人去高校深造，以应急需。1951至1953年，三穗县先后保送四人去学音乐、化学和美术，在小教中影响甚大。许多具有高中、中师、其他中专毕业或肄业学历者，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纷纷找来高中各科课本，抓紧进行复习，以求来年申请高考一试。

我嘛！虽偶尔看到别人获得选送时也心羡一阵，但仅读中师一个月，学历差一大节，又有了一双儿女的家庭负担，条件不够，也就不去追求了。

1954年，可机会却偏偏降到了我的头上，我被出乎意料地成为三穗县小学教师的唯一被选送人。可能前些年未经考试就直接保送入学，学生水平不齐的缘故，从该年起，则改为选送